

教材评价30年：演变轨迹与驱动因素

张大伟，王雪纯

摘要：作为教材建设的核心环节，教材评价是保障教材质量、推动教育改革与创新的重要根基。系统爬梳中国近30年教材评价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脉络，旨在厘清我国教材评价体系构建的动态演变轨迹及核心驱动因素。我国教材评价体系的构建肇始于政策与市场的双重合力，其发展路径呈现出从整体评价到以学科细化为特征的分类评价样态，教材评价主体结构经历了从单一主体到多元主体的转型。在具体的评价维度方面，逐步形成了以价值引领（value）为主导，内容维度（content）、形式维度（format）和适切性维度（suitability）协同的“V-CFS一元多核”教材评价体系。

关键词：教材；教材评价；评价体系；评价维度

中图分类号：G4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25)09-0040-07

科学的评价体系对教材建设具有基础性、引导性作用。没有科学的评价体系，就无法合理选用教材，激励机制也难以发挥最大效用。将科学的评价体系作为教材建设制度创新的基座，能够有效调动教材编写的积极性、教材创新的能动性，逐步使教材建设体系化、教材使用规范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教材建设工作，这一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依然存在，如中小学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教材及教辅材料中仍然存在“换皮出版”等现象^[1]；在高等教育教材使用方面，“校本意识”等情况较为突出^[2]，这些问题仍需要通过制度创新予以破解。作为确保教材质量的有效手段^[3]，教材评价近年来受到学界、业界与管理者的普遍关注。不少学者提出了包含多种维度和指标的教材评价体系，但由于未能形成普遍共识，现有教材评价体系研究成果尚不能有效引领并满足教材

建设工作的实际需求。

教材评价体系构建是一项复杂工程，主要涉及“评什么”“谁来评”和“怎么评”的问题。相应地，评价对象、评价主体和评价维度是构成教材评价体系的关键三要素^[4]。通过梳理发现，较早的关于教材评价体系构建的CSSCI期刊论文发表于1996年，故笔者将其看作本领域学术研究的起点。鉴于此，本文选取1996年以来的87篇CSSCI期刊文献作为主要研究文本。通过梳理教材评价体系的研究历程，从纵向视角追溯教材评价研究的起点和现实需求，深入剖析推动其研究进展的关键因素，并对评价维度的演变进行深描，以期完善教材评价体系的理论基础。

一、政策与市场合力：教材评价体系构建研究的起点

现实需求是学术研究的动力和起点。新中国

基金项目：2021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代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研究”（21JZD062）；2024年度教育部规划一般项目“中国新闻传播学教材建设史（1978—2023）”（2023GH-YB-GJ-Y-03）。

作者简介：张大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副主任（上海200403）；王雪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03）。

成立之初,我国确立了由国家统一管理教材事业的基本方针,并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全国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工作。“一纲一本”既是教材编写制度,也影响了教材的选用与发行。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在教材评价领域的研究始终缺乏现实动力,难以形成系统性研究成果^[5]。直至1987年《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章程》和1988年《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的出台,教材编写从“一纲一本”发展成“一纲多本”。在国家教委的统筹下,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八所师范院校及广东、四川、上海、浙江、河北等地区,完成了不同学制、不同地区的“八套半”教材编写工作,这标志着我国教材从“国定制”正式转向“审定制”。

“审定制”的推行意味着教材市场格局迎来重大调整,进而引发了出版社之间的激烈竞争。实际上,教材市场开放所产生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开放为教材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教材数量显著增长,师生在教材使用上拥有了更多的选项^[6]^[4];另一方面,“没有了国家层面设计的统编教材,教材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这也导致了出版、发行等各方面的问题”^[7]。具体而言,有学者通过深入研究我国近代中小学教材的发行历史,揭示了教材恶性竞争的诸多弊端:“一是不顾成本,大打价格战;二是任意加大回佣,带有行贿性质,全在暗中进行;三是竞相走后门,与教育行政部门拉关系。”^[8]为有效遏制教材发行过程中的无序竞争,国家教委于1992年颁布了《关于九年义务教育小学、初级中学教材选用工作的意见》,为全国中小学教材选用提供指导,并对教材的选用范围和权限作出明确规定。此后,国家教委在总结前几年教材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于1995年颁布《中小学教材编写、审查和选用的规定》,对教材选用的相关规定与要求进行了补充,进一步提出“承担国家统一规划教材编写任务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确定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使用这些教材的最低的保护性订数”^[9]。这些文件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教材市场长期存在的“利益营销”乱象。

同时,教材管理制度的变革也意味着出版社必须在编写和出版环节多“下苦功夫”,毕竟

“最终在竞争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质量,优胜劣汰是规律”^[8],教材质量审核的标准更加严格。当时,教材市场虽“不乏一些精品教材,但不少教材是在同一水平上重复,缺乏特点,更无新意,雷同现象不可谓不严重”^[10]。教材质量参差不齐且同质化严重的局面,倒逼教材建设者等开展教材评价工作。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需要通过评价来确保对中小学教材有足够的投入和高质量的产出,且不重复浪费;另一方面,地方和学校需要通过评价来选择、使用教材。^[11]扎实推进教材评价工作,离不开科学的教材评价体系构建,研制统一的评价尺度,有利于确保教材评价的客观性,进而提升评价工作的信度。^[4]在此背景下,教材评价体系的研究成为学界集体攻关的重点方向,师范类高校、教育研究机构和主要教材出版社对此尤为重视。

一是国家级课题的立项支撑教材评价体系研究。1996年,华南师范大学高凌飏的“我国义务教育教材评价体系研究”项目,获批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项目组汇聚了来自华南师范大学、课程教材研究所、人民教育出版社及西南大学等单位的32名研究人员。研究人员考察了北京、广东、上海等地的15个实验区的中小学一线教师对教材的动态和静态评价。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基础教育教材评价:理论与工具》出版后便成为学界开展教材评价研究时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被引用次数超过200次。同样,高等教育教材评价研究工作也逐步受到国家管理部门的重视。由上海交通大学主持,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和人民卫生出版社参与的“高等教育教材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项目,于2000年获得教育部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立项。

二是期刊论文的发表带动教材评价体系研究。1996年,课程教材研究所的研究员李慧君发表了聚焦教材评价体系构建的论文,这一研究成果为教材评价体系构建研究迈出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一步。1996年至2000年间,尽管学界公开发表的围绕教材评价体系构建的CSSCI期刊论文仅有4篇(见下页表1),但均属于高被引作品,为我国教材评价体系构建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中,有3篇论文发表于《课程·教材·

教法》，这反映出学术研究的发展离不开学术期刊平台的大力支持。

表 1 1996—2000 年教材评价体系相关论文

发表年份	论文题目	发表期刊	作者	被引量
1996	《教材评价的指标体系的制订》	《课程·教材·教法》	李慧君	133
1998	《教材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课程·教材·教法》	丁朝蓬	282
1998	《论对外汉语教材评估》	《语言教学与研究》	赵金铭	2 538
2000	《教材评价的本质、标准及过程》	《课程·教材·教法》	丁朝蓬	400

注：被引量统计截至 2025 年 3 月 26 日。

二、从整体到分类：教材评价体系的学科细化趋势

确定教材评价的对象是明确“评什么”的问题。在教材评价体系构建初期，研究主要围绕基础教育教材展开，旨在为“一纲多本”的教材审定提供依据。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管理人员和专家逐渐认识到，不同学段、不同学科的教材存在显著差异。由于学科知识体系不同，教学对象各异，教材评价标准也应同中有异。尤其是随着高等教育教材、职业教育教材数量的急剧攀升，教材种类重复与匮乏并存等现象出现^[12]，这使主管部门及学界意识到通过科学的教材评价引导高等教育教材和职业教育教材建设，不仅可节省教育资源，也有助于提升教学质量。

在现实需求与研究深化的双重驱动下，教材评价体系研究在世纪之交逐渐走向学科细化。通过系统搜索 CSSCI 期刊发现，1998 年，赵金铭发表的《论对外汉语教材评估》，开展了对外汉语教材评价的研究；2001 年，刘中仁和熊斌发表的《高等教育教材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初探》，是我国较早的关于高等教育教材评价体系研究的论文；2001 年，黄牧航发表的《中学历史教材的评价模型论纲》，是较早的关于中学历史教材评价研究的论文。笔者根据是否以学科为研究对象，对现有 87 篇 CSSCI 期刊文献样本进行了分类编码，发现有 25 篇文献属于教材评价整体性研究，占比约为 28.7%；13 篇文献以基础教育教材为评价对象，4 篇文献关注高等教育教材，3 篇文献聚焦职业教育教材；其余 42 篇文献具有明确的学科指向，涵盖 20 个学科的教材评价体系。其中，基础教育涉及科学、语文、数学、音乐、体育与健康、美术、物理、化学、地理、

历史、生物学等学科，高等教育则涉及专业英语、公共英语、国际中文教育、体育、外国语言学、新闻学、翻译学、法学、语言学等学科。在同一学科内部，不同类型课程教材的差异化评价体系也受到学界的关注，如有学者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分别就新闻学理论型课程教材和实践型课程教材构建了差异化的教材评价标准。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教育部《2023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职业教育有近 3 000 万的在校生，但仅有 3 篇文献探讨职业教育教材评价。不仅如此，高等教育理工科教材评价研究也有待丰富。

三、从单一到多元：教材评价主体的演变

教材评价主体的选择是解决“谁来评”的问题。梳理现有文献可知，部分研究人员构建教材评价体系时，并未对评价主体作出清晰界定，这潜在地影响了评价体系的“可实施性”。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评价主体往往根据自身认知开展教材质量评价工作^[13]。换言之，教材评价主体选择的合理性直接关系教材评价结论的科学性。鉴于教材评价是一项覆盖面广、影响深远的实践活动，评价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如何选择、选择哪些评价主体。

教材评价研究的发端，主要是服务教材审定的需要。1993 年国家出台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学校教材要反映中国和世界的优秀文明成果及当代科学技术文化的最新发展，中小学教材要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多样化。该纲要确立了我国运行二十多年的“一纲多本”教材审定管理制度。由此，教材评价研究围绕教材审定工作展开，旨在为教材编写质量的分析与评价提供基础^[14]。李慧君在研制教材评价

体系的过程中,把使用教材的学校领导、班主任、任课教师、学生和家长都纳入评价主体。不过,究其目的,还是充分了解学生和教师对教材的真实看法,以助力教材把关审查^[14]。教育部牵头组织论证的高校教材评价体系存在一定局限性,该体系主要出于管理需求,将政府主管部门组织的专家学者视为评价主体,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教材使用者这一核心服务主体。例如,2001年教育部组织的高校“两课”教材评估,以公平、公正、保密为原则,第一阶段将“两课”教材体系结构、内容安排、观点分析、语言表述、编校质量等作为评估标准,第二阶段根据匿名通信评审结果进行会议集中评审。

随着教材评价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逐渐认识到教材所承载的教与学两大基本功能。这意味着教师与学生应参与教材评价,教材评价研究逐步从“服务教材审定”向“服务教学”转变。教育部2003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价的若干意见》,强调将社会力量作为主体之一纳入教育评价环节,形成了以学校为核心、政府部门引导、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评价体系^[15]。受教育评价开始注重社会力量的影响,在探讨构建中学化学教材评价体系时,杨承印和孙亮从教学的现实需求出发,聚焦教材使用的适切性,考虑教材“是否适应本地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是否适应本地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和需要,促进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掌握和认知能力的发展,以便国家教育目标和学校培养目标的具体实现”^[16]。在其他不同学段和学科的教材评价研究中,教材使用者开始受到普遍重视^[17],这推动教材评价体系从单一评价主体(管理者)转向二维评价主体(管理者和使用者)。

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这一重要理念,为教材评价工作指明了新的方向。在此阶段,教材评价愈发强调多主体协同参与,其目标不再局限于筛选出高质量教材,更在于规范教材使用、引领教材建设方向。鉴于出版社编辑对出版管理要求和市场反馈十分熟悉,有学者在构建新闻学理论型课程教材评价体系时,将出版社编辑界定为教材“生产者”,与教材“管理者”、学生和教师等教材“使用者”一起,被纳入评价主体范

畴^[18]¹⁰⁸。这种将“生产者”“管理者”和“使用者”一并纳入教材评价主体的评价共同体模式,由“生产者”“管理者”“使用者”各主体分别对不同维度的教材质量展开评价,以确保教材评价实践的科学性,为精品教材建设提供评价支撑^[19]。

四、一元多核:教材评价体系维度的构建

教材评价体系维度的选取旨在回应“怎么评”这一关键问题。而构建科学且合理的评价体系则是进行教材评价实践的基石。经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深入剖析发现,教材评价体系的指标主要聚焦科学性与思想性这两个核心维度。

(一)稳定的内核:基于CFS构建的教材科学性评价

作为评价教材质量的关键要素,在教材评价体系构建研究初期,科学性便在学界引发广泛讨论。笔者研读相关文献,根据科学性层面所涉各个维度的内涵,对其进行了细致梳理与统一表述。例如,丁朝蓬在《教材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中提及的“材料内容的选择”,与刘中仁、熊斌在《高等教育教材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初探》中强调的“材料选择”,这两个表述内涵相近,故而统一表述为“内容选择”。又如,翟志峰和董蓓菲在《国内外教科书评价标准的评价维度和价值取向——基于NVivo11.0的编码分析》中、丁朝蓬在《教材评价的本质、标准及过程》中分别提到“组织和呈现”“内容呈现与表达”维度,可以统一表述为“内容呈现与表达”;唐丽芳、丁浩然在《建构以质量为核心的教材评价体系》中提到的“教学适切性”,与李辉等人在《关于建立高职教材评价指标体系的对策研究》中提到的“教学适用水平”,二者内涵相近,可以统一表述为“教学适切”。对上述指标进行归类分析发现,教材评价体系科学性层面的主要维度可概括为内容维度(content)、形式维度(format)和适切性维度(suitability)(见下页表2)。教材科学性的评价CFS三维度演进,呈现出从初步探索到系统深化,再到完善与创新的发展过程。具体而言,在前期,主要聚焦教材的内容和形式;在中期时,开始拓展多维度指标;在后期则引入适切性维度,以进一步完善评价体系。

仔细分析 CFS 主要指标的演变轨迹不难发现, 实践需求是推动教材评价指标持续丰富与完善的关键因素。首先, 作为高质量教材的核心取向, 内容质量自始至终都是衡量教材科学性的关键维度。在较早的教材评价体系中, 内容选择、个性特色和趣味性等指标被纳入内容维度^[20]。考虑到教材编写过程中应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对知识进行组织编排, 丁朝蓬在教材评价体系中整合了内容组织指标。在“一纲多本”教材管理政策的推动下, “突出特色”成为教材建设的必然要求, “好的教材必须有自己的特点”^[21], 这促使“个性特色”指标被纳入教材评价体系中。综合来看, 教材评价的内容维度包含了内容选择、内容组织、趣味性、个性特色、难易程度、规范性和语言技巧七项主要指标。

其次, 学界对教材的定义存在“狭义”与“广义”之分, 这使得对教材形式维度的评价存在差异。从狭义的教材定义来看, 形式维度主要考察教材的出版质量^[22]; 而依循广义的教材定义, 教材评价还要考虑相关教材配套资源^[23]。在形式维度指标的形成过程中, 李慧君提出“文字表达”“图文与表格”“印刷与装帧”这三项关键指标。赵金铭率先将配套资源作为重要指标纳

入教材的形式维度评价, 具体包括习题配套、音像资料配套等。为了将知识以学生容易接受的形式呈现出来, 需要将编写者的设计思想转化为结构化的教材内容。这样一来, 设计与编排作为重要指标被纳入教材评价体系中^[24]。目前, 教材评价的形式维度主要涵盖设计与编排、文字表达、图文与表格、资源配套、内容呈现、印刷与装帧和编写与校对七个具体指标。

最后, 教材适切性维度主要考察教材与培养目标、教学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匹配程度^[25]。李慧君将教材与教学目标、教学大纲(课程标准)适切、与学生的认知及心理发展水平适切作为教材适切性的关键指标。赵金铭将学生职业发展适切性指标纳入考量, 以评价教材是否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2001 年, 适切性内涵进一步扩展, 教材与教师水平、使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培养学生实际问题能力的适应程度等指标被纳入教材评价适切性维度^{[6]7}。至今, 教材评价的适切性维度主要包括与教学目标、教学大纲(课程标准)适切, 与学生职业发展适切, 与教师使用适切, 与学生认知及心理发展水平适切, 以及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适切五项具体指标。

表 2 教材评价体系科学性层面的主要维度及指标(部分)

内容维度 (content)	频次	形式维度 (format)	频次	适切性维度 (suitability)	频次
内容选择	56	设计与编排	43	与教学目标、教学大纲(课程标准)适切	51
内容组织	36	文字表达	36	与学生职业发展适切	33
趣味性	12	图文与表格	35	与教师使用适切	29
个性特色	9	资源配套	30	与学生认知及心理发展水平适切	18
难易程度	9	内容呈现	24	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适切	14
规范性	8	编写与校对	12		
语言技巧	8	印刷与装帧	19		

(二) 价值引领: 凸显国家事权的教材思想性评价

教材建设作为国家事权, 其核心要义在于落实党和国家意志, 实现教材培根铸魂的育人功能^[26]。现阶段, 教材建设者已深刻认识到“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的重要性, 认为教材的思想性“是统领, 是底线, 是教材的‘政治关’”^[27],

是新时代教材评价的首要维度。然而, 在教材评价体系构建的历程中, 思想性维度并非自教材评价研究伊始便得到普遍重视。具体而言, 1996 年至 2000 年间的教材评价体系研究尚未充分体现思想性维度。2001 年, 黄牧航提出, 历史知识如何帮助学生提高思想道德修养, 认同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并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 这是历史

教材的关键使命之一。他将思想文化作为重要维度纳入中学历史教材评价体系,这表明教材的思想性评价日益受到重视。此后,大多数教材评价体系均将思想性视作重要维度之一。例如,高凌飏指出,教材应具备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展现高尚的道德情操,于潜移默化中助力学生提升思想觉悟、培育文化涵养,塑造良好的道德风范。在自然科学课程教材评价中,教材的思想性同样是关键指标。以高中物理教材评价体系为例,评价时要重点考察是否向学生传递科学文化观(涵盖科学的本质、价值、态度、精神等),是否契合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要求^[28]。然而,在各评价维度的权重分配上,知识性维度依旧优先于思想性维度^[29]。也就是说,尽管学界普遍认可将思想性纳入教材评价指标,但对思想性的重要性,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的重要论断,这迅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具体研究中,学者开始将思想性置于教材评价的核心位置。教材可以被允许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唯一不被允许的是意识形态的缺陷,这种缺陷会导致教材被一票否决^[30]。在相关文献中,对思想性的命名并不相同,有“思想性”“思想水平”“文化选择”“政治思想”“价值取向”“政治立场”和“思想引导性”等表述,甚至在具体学科教材评价体系中作了更具针对性的细化,如构建新闻学教材评价体系时,将思想性具化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教材中的体现”这个一级指标^[18]^[105],但仔细分析具体表述可清晰地发现,其内涵存在一致性。将价值引领作为教材评价的首要维度,彰显了教材建设必须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严把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承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使命。

参考文献:

- [1] 李鹏,石伟平.什么样的教材是“好教材”:职业教育教材评价的理论反思[J].教育发展研究,2019(19):59.
- [2] 张涛甫,张大伟.脱嵌与回归:新闻学教材建设的意识形态考量[J].现代出版,2021(4):12.

- [3] 吕玉曼,徐国庆.教材质量评价的内容取向:以职业教育教材为例[J].教育发展研究,2021(1):41.
- [4] 丁朝蓬.教材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J].课程·教材·教法,1998(7):44.
- [5] 高凌飏,张廷凯.基础教育教材评价:理论与工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3.
- [6] 黄牧航.中学历史教材的评价模型论纲[J].课程·教材·教法,2001(8):4-7.
- [7] 吴雪燕.改革开放后“八套半”教科书的研究:背景、建设过程及反思[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2:62.
- [8] 史鉴.中小学教材制度走向:前瞻与回顾[J].课程·教材·教法,2003(4):64.
- [9] 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小学教材编写、审查和选用的规定[J].学科教育,1995(10):2.
- [10] 赵金铭.论对外汉语教材评估[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3):5.
- [11] 高凌飏.关于教材评价体系的建议[J].全球教育展望,2002(4):46.
- [12] 卢松芳.新闻传播类本科教材的困境及建设性路径[J].青年记者,2021(16):98.
- [13] 潘信林.教材评价主体之间的差异及其整合[J].课程·教材·教法,2022(12):74.
- [14] 张爱萍.基础教育课程教材适切性评价研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5(7):45.
- [15] 冯丹,朱德全.中国教育评价改革的制度变迁:脉络、逻辑与路向[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3(10):71.
- [16] 杨承印,孙亮.中学化学教材评价体系研究[J].课程·教材·教法,2004(8):59.
- [17] 王小梅,杨亚军.基于可读性理论和模糊层次分析法的英语教材评估体系的研究与设计[J].中国外语,2012(3):67.
- [18] 张大伟,王梓,谢兴政,等.新闻学专业理论型课程教材评价指标研究[J].新闻大学,2020(12):105-117.
- [19] 吕建晴,袁帅,潘信林.大教材评价观的科学内涵、功能定位及实践路径[J].教学与管理,2024(16):63.
- [20] 李慧君.教材评价的指标体系的制订[J].课程·教材·教法,1996(3):15.
- [21] 高凌飏.基础教育教材评价体系的构建问题[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6):95.
- [22] 张大伟,王梓.新闻学专业实践型课程教材评价指标体系创新研究[J].新闻大学,2021(9):7.
- [23] 王伟波,王玉苗.职业教育精品教材评价标准研究

- 与探索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05 (34): 59.
- [24] 刘中仁, 熊斌. 高等教育教材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初探 [J]. 中国大学教学, 2001 (5): 29.
- [25] 王晓丽, 芦咏莉, 李斌. 教材适切性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J]. 课程·教材·教法, 2014 (10): 42.
- [26] 罗生全, 杨柳. 论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法理逻辑 [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21 (5): 35.
- [27] 王晓丽. 国外教材评价: 基本特征、发展趋势及启示 [J]. 课程·教材·教法, 2016 (9): 111.
- [28] 邓磊, 廖伯琴. 基于国际比较的我国高中物理教科书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研究 [J]. 教育学报, 2010 (3): 71.
- [29] 高凌飏. 教材评价维度与标准 [J]. 教育发展研究, 2007 (12): 9.
- [30] 石鸥. 教科书概论 [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9: 114.
- (责任编辑: 王 润)

30 Years of Textbook Evaluation: Evolution Track and Driving Factor

Zhang Dawei, Wang Xuechun

Abstract: As a core link of textbook construction, textbook evaluation serves as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ensuring textbook quality and propelling educational reform and innovation. By systematically reviewing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evolution track of China's textbook evaluation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he article aims to clarify the dynamic evolution track and core driving factor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extbook evaluation system in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riginates from the dual force of policy and market, its development path shows a category evaluation pattern with the feature from overall evaluation to evaluation classified by discipline, and the subject has undergone a shift from a single subject to multiple subjects. In terms of evaluation dimension, a "one subject and multiple cores V-CFS" textbook evaluation system has gradually taken shape, which is dominated by value and coordinated by content, format and suitability.

Key words: textbook; textbook evaluation; evaluation system; evaluation dimension